



V I N C E N T
B . L E I T C 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

文森特·里奇作品集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
美国文学批评

[美] 文森特·里奇 (Vincent B. Leitch) 著

王顺珠 (Shunzhu Wang) 译

美国高校广为采用的文学理论教材
已被翻译成匈牙利语、日语和韩语
被评为杰出学术著作
荣获美国高校研究图书馆协会最佳选择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VINCENT
B. LEITC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
美国文学批评

[美] 文森特·里奇 (Vincent B. Leitch) 著

王顺珠 (Shunzhu Wang)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6-75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 / (美) 里奇 (Leitch, V. B.) 著; 王顺珠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301-22047-4

I. ① 2… II. ①里… ②王… III. ①文学批评史—美国—现代 IV. ① 17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9458号

Vincent B. Leitch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

Copyright © 198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

著作责任者: [美]文森特·里奇 著 王顺珠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047-4/1·258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8.5印张 520千字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一

王 宁

在当今的英语世界出版的众多讨论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中,《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无疑是最具权威性和最全面的史书之一,同时也是文森特·里奇教授的一部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以史的叙述为纵轴,亦史亦论,史论结合,充分体现了里奇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的著述风格。就本书所含的信息量而言,确实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作者虽然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描述和讨论,但上限却涉及了一些战前的文学和批评现象,下限则一直讨论到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对我们了解整个 20 世纪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演变起到了清晰的导引作用。

我们注意到,作者并没有使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这个术语,而是用了一个涵盖面更广且更注重实践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来描述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我对此也深有同感,我想这大概也是本书作者的别具匠心之处吧。我们一般在讨论美国文学理论批评时,总是喜欢将其与欧洲大陆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相关联,并得出结论,在美国流行的文学理论大多源出于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而这些理论最终旅行到了美国,并且在这块批评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且结出异样的果实。而且不少在全世界知名的理论家正是通过其著作在美国的风行而随后在全世界知名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通过里奇的精细描述和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有着两条平行的发展线索:其一是出自本土的文学创作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这在本书所描述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芝加哥学派、纽约知识分子学派等章节中可以见出;另一条则是与欧陆的各种文学以外的理论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学院派理论批评,如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但即使是在描述这些带有明显的欧陆色彩的批评理论时,里奇也强调其在美国语境下的变异和独特之处,而最后所讨论的黑人批评以及文化的全球化,则

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本土的产物。因此难怪美国文论大家希利斯·米勒称该书为“第一部对3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史的全景的、无所不包的巨著”。在米勒看来：“里奇的叙事是权威的，不偏不倚的……”我认为这一方面在于，本书在所含史实方面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由于作者本人的特长及偏好，他对解构主义批评的讨论尤其显示其扎实的功底和评价的中肯。当然，读完全书，我不禁感到，如果换成伊格尔顿或卡勒来写这样一本书，也许前者会更为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因而会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着墨更多；而后者则会在侧重形式和美学批评的同时给予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以及叙事学批评理论以更多的篇幅。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本书作者取了这二者之外的中间立场，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对20世纪的美国文学批评进行中肯的描述和讨论。应该说，本书作者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因此我郑重将其推荐给中国读者和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专业人员和文学批评家。此外，本书也应该成为文科研究生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当然，由于本书的写作所经历的时间较长，即使几年前再版，但仍然不可能将所有具有较大影响的批评现象包括进来。尤其是对当今依然风行的生态批评，作者几乎一字未提，自然更无法去讨论后人文主义批评了。即使对后殖民批评的介绍也有些简单，尤其对霍米·巴巴的著述几乎未提。书中虽有一些篇幅提到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但最终还是未能就这一批评流派单独辟出一章或一节加以讨论，而是将其放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文化批评中淡淡地提及。这无疑是一点遗憾，但同时也反映出—个事实，中国学者在译介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并非完全根据其在西方语境下的实际影响，而更多的则是根据其与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如何。因此，在应作者之邀撰写这篇短序时，我也想谈一点我个人对当下的美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看法。

在我看来，当今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或“后批评时代”。那么何谓“后理论时代”？它与早先的理论批评的黄金时代有何不同？坦率地说，我这个命名受到我的英国朋友特里·伊格尔顿的一本书《理论之后》的启迪，但是我不像他那样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未来持悲观的态度，我恰恰以他那本书为起点，反其意而用之，将当今的西方文学理论所处的境遇描述为“后理论时代”。

首先，我想简略地概述一下我所谓的“后理论时代”之特征。所谓“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并不仅仅说明文学和文化理论衰落后的状态，这个“后”(post)既意味着时间上的“之后”(after)，同时也表明了内涵上的“超越”(beyond)，也即它既是

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内容：它标志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和轰动效应，“理论热”的大潮已逐渐消退，即使是最有影响力和持久性的理论也有其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它不可能用于解释世间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既然主要地来自文学和文化实践，那就理应返回它应该发挥功能的领域。因此，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并没有死亡，只是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所向披靡和无所不能的效应，但它依然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

其次，在“后理论时代”，所有的总体意识和中心意识都被解构，甚至分裂成了碎片。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说能够君临一切，甚至任何理论都很难持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它和其他理论呈一种共存和互动的状态，因此“后理论时代”又是一个没有主流和中心的时代，每一种理论都能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找到自己可赖以发挥作用的有限空间。

再者，“后理论时代”在解构了袭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后，实际上为原来处于理论关注之边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向中心运动铺平了道路，从而打破了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中国的文学和理论的“非边缘化”尝试中见出端倪。我们也可以从本书最后两章所讨论的“黑人批评”和“文化的全球化”中见出。可见，我们事先并没有进行交流，但各自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却能总结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发展走向，看来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的对话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2011年10月，我邀请了当今仍十分活跃的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来中国讲学，他与伊格尔顿的悲观论调截然不同。他除了否定“理论死亡”之说外，还就当今的西方文学理论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作了清晰的描述。按照他的描述，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有这样几个方向：首先是叙事学的复兴，也即传统的以结构主义的文本为中心的叙事学转向了更加宏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甚至与历史的叙述以及认知科学相关联。第二是“较多的德里达，较少的福柯和拉康”，这也说明了他本人对德里达的情有独钟，或者说，德里达所关注的对象虽然超出了文本，但依然很重视阅读和文本结构。第三便是“伦理学转向”，在经历了多年来的形式主义和文化批评后，伦理道德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因而当代文学理论中便出现了回归伦理学的倾向，在这一转向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界还出现了对动物的研究，也即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第四是生态批评，这虽然是卡勒本人很少关注或涉足的一个领域，但由于这一批评理论近年来声势浩大且影响面较广，并与当代人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他也

不得不给予必要的关注。第五是“后人文研究”(posthuman studies),在当今的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受到了质疑,面对机器的强大作用,人类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驾驭它并使之为我所用?这已经引起了当代理论家以及其他人文科学者的关注。第六便是“返回美学”,或者说所谓的“审美转向”,这是当今的不少文学研究者呼吁了多年的一个方向,现在,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以审美为主的方向终于在卡勒这里被权威性地提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当然,我对卡勒的上述宏观描述基本同意,但仍然也在不同的场合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和商榷。我始终认为,无论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或是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我们中国学者都应该积极地与自己的国际同行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对话。这样才能活跃理论争鸣的气氛,有利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我仍然记得,我当时在卡勒的讲演后立即就他的缺憾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性意见,并得到了他的回应。同样,我也记得我也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与本书作者就文学经典问题进行过直接的讨论和对话。通过这样的讨论和对话,我确实感到受益匪浅,同时也对我本人是否对西方文学理论真正理解作了检验。

最后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我和里奇教授虽然在2005年北京举行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研讨会上首次见面,并且一见如故,但是我们在在此之前就已经神交已久:我们的论文同时出现在欧美的学术刊物上,并且研究的课题也很相近。此外,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朋友,因此这方面的共同语言也比较多。上次由于时间很紧,未能将他请到清华大学演讲,我想随着本书中文版的出版,里奇教授再度来华访问讲学应该提到我的议事日程上了。我还应该指出的是,里奇教授对中国态度友好,尤其关注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国际文论界的地位和影响。在他担任主编的《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二版中,他在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毅然决定将中国旅美美学家李泽厚的《美学四讲》收入其中,从而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跻身世界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我相信,随着里奇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了解,他将会在未来的新版《诺顿理论批评文选》中收入更多的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著作,这样看来,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最后,我也要表达我对本书译者王顺珠教授的敬意。他历时数年,不辞辛苦地将这样一部信息量很大并且难度很大的学术理论著作译成中文,从而为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精神食粮。

2012年10月28日于北京清华园

序 二

王顺珠

(Shunzhu Wang, Rider University)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发展过程。特别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新世纪之交，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学说流派更是空前活跃，竞相跻身于本已十分拥挤的理论空间，纷呈庞杂，百家争鸣，众声喧哗。在一些传统保守的学者眼中，这一现象犹如滔滔洪水决了堤坝，凶恶的猛兽破了牢笼，恐慌者有之，愤怒者有之，于是纷纷奋起“自卫反击”，以捍卫“他们的”领地之完整，纯净“被污染”的理论空间。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捍卫不可避免地更加速了理论学科领地的“瓦解”与“支离破碎”，使得本来已经纷呈庞杂、众声喧哗的理论空间更加拥挤不堪、喧嚷吵闹，令人晕晕然，应接不暇。

文森特·B. 里奇 (Vincent B. Leitch) 教授著述的《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一书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精心的纵向和横向的梳理和精辟的论述。他以渊博厚实的文学和理论功底、睿智的洞察力追溯了美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各流派与欧洲大陆各学术流派的历史渊源，描述了它们得以在美国本土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土壤和政治语境，并梳理归顺了它们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葛。更为难得的是，里奇教授叙事深入浅出、生动流畅。众家批评理论本来深奥庞杂，叙事往往流于术语的刻意玩弄，晦涩难懂；而本书的叙事却经络分明，条理清楚，娓娓道来，清晰易懂，亲切生动。因此，一于 1988 年出版，就不仅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好评，也深受广大大学生、研究生和文学批评爱好者的喜爱。

《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 刊文称：“很难想象会有哪本书能比这本书对当代批评境况的研究更有用处……《美国文学批评》^[1]既是一部文学批评史的精辟描

[1] 指本书。——译注

述，也是一部批评生产模式的锐利析论。它是理论界的权威性论著，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着这一权威的位置。”著名的美国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专家、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杰出教授的约瑟夫·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称该书为“第一部对3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全景的、无所不包的巨著”。他认为：“里奇的叙事是权威的，不偏不倚的……”另一位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当时任职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教授赞道：“就文学批评和理论而言，这是一本既可读又可靠的指南。对于从事文学批评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人来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有极大的裨益。”

该书被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评为1988年杰出学术著作，荣获1988年高校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最佳选择(Choice)奖。自问世以来，该书越来越被广大读者、学者所钟爱，现已成为美国高校广为采用的文学理论教材，并被翻译成匈牙利语、日语和韩语。

全书除序、索引和后记外，还包括如下章节：

- | | |
|------------------|---------------------|
| 第一章 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 第八章 读者反应批评 |
| 第二章 “新批评” | 第九章 文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
| 第三章 芝加哥学派 | 第十章 解构主义批评 |
| 第四章 纽约知识分子学派 | 第十一章 女权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神话批评 | 第十二章 黑人美学 |
| 第六章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批评 | 第十三章 60年代到80年代的文化批评 |
| 第七章 阐释学 | 第十四章 文学的全球化 |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原版只有前十三章，覆盖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这里的第十四章是里奇教授前几年出席中国的一次题为“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译者有幸应邀与里奇教授同行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做了发言，并将他的发言译成中文。他的这次发言，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的全球化现象做了精辟的描述，所以将其收入增补为第十四章。

正如米勒对原著的推荐语所说，该书是一部“全景的、无所不包的巨著”。翻译中涉及的无数人名、地名、书名、专用词和术语，往往有不同的译法，比如Jameson，就有“詹姆逊、詹姆森、杰姆逊、詹明信”等多种翻译，如何定夺才好，无疑对译者是

一个挑战。对这些，译者力求与国内比较通用的译法保持一致，并在第一次出现的译文后加括英文原文。在此，我亦想对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不仅于百忙中抽空仔细阅读译稿，捉笔写“序”，而且还对一些人名、术语的译法提出了宝贵意见。最后，这本译著的编辑工作量极大，很繁杂，责任编辑于海冰老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她的辛勤付出，译者也谨此表示敬意感谢！

目 录

序一	王 宁 3
序二	王顺珠 7
第一章 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1
第二章 “新批评”	25
第三章 芝加哥学派	62
第四章 纽约知识分子学派	83
第五章 神话批评	117
第六章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批评	148
第七章 阐释学	180
第八章 读者反应批评	207
第九章 文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232
第十章 解构主义批评	260
第十一章 女性主义批评	300
第十二章 黑人美学	327
第十三章 60年代到80年代的左翼批评	364
第十四章 文学的全球化	405
索 引	418
后 记 历史的生成语境	442

第一章 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对于美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史学者来说，20世纪30年代最辉煌的一页也许是以下四大重要学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学派、新批评学派、芝加哥学派和纽约知识分子学派。毋庸置疑，这些学派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承前启后的；而且，每一个学派的发展都与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和其他群体势力密切相关。显然，我们必须用不同的历史分析模式来检视这些多元的、相互争鸣的批评学派，但是可以说，30年代的经济、政治与知识领域的力量是其发展的共同基础，尽管这是一个裂痕斑斑、构成庞杂的基础。“大萧条”就是美国历史上20世纪30年代众多的社会经济现象和文化问题的标志。

大萧条

1929年10月是令人疯狂的一个月。这个月，发生了“股票市场的崩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值猛跌37%。此后的12年里，美国始终处于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中。1929年9月，《纽约时报》的股票平均高达425点，可是到了1932年7月却猛跌到了52点。1929年到1932年之间，美国的个人收入下降了50%多。1932年，失业率高达约25%，人数达1300万。1919年一蒲式耳小麦值2.16美元，可是1932年只卖0.38美元；在这期间，一磅棉花从高达差不多42美分跌到5美分左右。1930年到1934年，大约有100万户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农场，被抵押贷款银行占有。整个大萧条期间，传统的农耕生存模式处于严重的危机。193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就任总统时，全国五分之四的银行倒闭，金融体系面临崩溃。80年代一位温和的历史学家对此估计道：“这场崩溃已经揭示，这个国家的企业是不稳固的。最糟糕的是，企业在垄断价格、谋取利润的同时，又压低工资……其结果是，约三分之一的个人收入流入了百分之五的人口的口袋。”^[1]

[1] George B. Tindall,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4), p.1052.

20 世纪 20 年代的资本积累及其不平衡分配的导因是利润的膨胀，巨额股息以及富裕阶层享有的巨额免税。由此造成的巨额金钱资源积累带来的是一个疯狂的投机时代。同时，过量的储备导致了需求的降低。这种经济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低工资、高价格、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另一方面是反托拉斯法规的执行不力和对劳工会的集体力量的广泛怀疑。总之，政府平衡经济不平等的机制不是形同虚设就是根本不存在。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 力求弥补政府政策的失败，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找到一条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讲，30 年代的“新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安装了一个福利国家。比如，1935 年，罗斯福推出了社会安全法，国家劳动关系法、公共事业振兴署，以及税务法。这些现在都已经成为一个个历史里程碑。且以税务法为例，它提高了对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上者的附加税，对收入超出 500 万美元者征收分级税（最高税率达 75%），对企业公司收入设以超额利润税，并设立了房地产税和赠与税。尽管有了这样的改革，罗斯福本人在他第二次就任总统时（1937）的就职演说中还是承认：“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房匮乏，吃不保，穿不暖。”他的这句话令人难忘。这种情形贯穿了整个 30 年代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了解了大萧条时期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我们就不会对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重要思潮感到意外了。不过，如果把美国的历史向前追溯半个世纪，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社会主义运动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展了。1877 年，社会劳动党形成，此后，社会民主党于 1897 年成立，美国社会党于 1901 年建立，还有 1905 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即世工盟）。在 1900 年、1904 年、1908 年和 1920 年的总统大选中，美国选民可以投社会主义党派候选人的票。比如，在 1912 年的大选中，犹金·V. 德布斯 (Eugene V. Debs) 获得了 90 万张选票——占大众选票的 6%。同年，三十三个城市的市长都是社会主义党派人士。1932 年大选时，社会党的诺尔曼·托马斯 (Normal Thomas) 得票 90 万张，共产党的威廉·Z. 福斯特 (William Z. Foster) 得票 10.3 万张。在 20 世纪早期，美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各种思潮拥有 100 万选民，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尽管他们仍是边缘群体。

1919 年，社会党中的左翼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1923

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合二为一。直到30年代中期，许多美国共产党人都视社会党人为骗子和法西斯。在建党初期，美国的共产党基本上是跟着莫斯科走。最初，共产党是一个秘密组织，1923年才得到合法承认。1935年以前，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极左”的宗派组织。但是，在1935年至1939年这段民粹主义的“人民阵线”时期，共产党的方针开始温和下来，寻求各党派开明人士——包括“新政”的拥护者——的支持。这一戏剧性转变是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30年代初，共产党只有7000名党员，可是到了1939年，党员人数已达到75000名。而且在有些领域，党的影响还常常超出这个范围，远及党外人士。^[2]使许多美国人走向激进的原因很多，经济大萧条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还有西班牙内战——就像后来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也把许多美国人推向激进行列。对于发生在西班牙的这场斗争，美国方面保持中立，而苏联却支持西班牙共和力量抵抗法西斯，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仰。30年代期间，重要的知识分子大多站在共产党一方，有些参加了共产党，有些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同路人”）。

1932年9月，包括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内的53名艺术家和学者联名写信，声援革命的共产党，支持威廉·福斯特竞选总统。美国作家联席会是1935年成立的一个颇具影响的“人民阵线”组织，其成员包括尼尔森·阿尔戈伦（Nelson Algren）、凡·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欧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柯里夫顿·法蒂曼（Clifton Fadiman）、詹姆斯·T.法瑞尔（James T. Farrell）、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欧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威廉·萨罗扬（William Saroyan）、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纳撒尼尔·威斯特（Nathanael Wes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2] Hal Draper, "Pie in the Sk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May 1984, pp. 25, 28-31; and Irving Howe and Lewis Coser,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 (1957; New York: Praeger, 1962), pp. 225, 419.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以及理查德·赖特 (Richard Wright) 这样的著名作家。^[3] 30年代期间,左派刊物盛行:从教条主义的《工人日报》到充满空洞说教的《新群众》,从学术性的《科学与社会》到文学性的《党派评论》。毋庸置疑,早一代的重要文人——比如威廉·迪安·豪厄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爱德华·贝拉米 (Edward Bellamy)、杰克·伦敦 (Jack London)、厄普敦·辛克莱 (Upton Sinclair) 和西奥多·德莱赛 (Theodore Dreiser)——就曾支持社会主义的研究项目与刊物。而且,早先的刊物就欢迎社会主义批评:比如《同志》(创刊于1901)、《大众》(1911)、《新共和》(1914)、《解放者》(1918)、《国家》(在1918年的自由化以后创刊)以及《现代季刊》(1923)等。尽管受各种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各组织团体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但是它们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中期一直坚持在美国活动。这段时期,艺术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经常参加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干部和派别之间经历着内部纷争的同时,“红色恐慌”也带来了外在威胁。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恐慌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1917年通过“反间谍法”和1918年通过“防煽动叛乱法”后,许多社会党人被捕入狱。芝加哥有一百多名世工盟成员因反战被判刑;犹金·V.德布斯因其言论中常有鼓动抵制征兵的倾向而被判二十年(德布斯后来被哈丁总统赦免)。1919年,司法部属下的情报总局开始收集有关激进分子的材料。同年,249名激进分子,包括爱玛·格尔德曼 (Emma Goldman) 在内,未经法庭审理就被遣送俄罗斯。次年,纽约立法机关开除了五位合法当选的社会党立法委员。1921年,臭名昭著的萨克-万泽蒂 (Sacco-Vanzetti) 一案的裁定就是在这样一种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歇斯底里的恐慌的重要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起重大的“红色恐慌”事件从1947年一直延续到1954年,它与外部的国际冷战呼应。1947年3月,杜鲁门 (Truman) 总统发布行政令,要求所有的联邦雇员都得在一份忠诚宣誓上签字(在四年时间内,这份命令对三百万人造成了影响)。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里法案 (Taft-Hartley Act) 是一项控制工会活动的法案。它要求工会领导保证,他们不是共产党员。1948年,一位叫阿尔杰·希思 (Alger Hiss) 的公众人物被指控为苏联间谍。此案闹得沸沸扬扬,因为他拒不承认,结果被另以伪证罪判刑。几年后,朱利亚斯和爱丝尔·罗森伯格夫妇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3] Harvey Klehr, *The Heyday of American Communism: The Depression Deca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353–357.

的命运更惨，双双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1950年的麦卡龙内部安全法案 (McCarron Internal Security Act) 要求，共产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阵线组织必须向司法部报告登记。此法案的执行由颠覆活动防控委员会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 负责 (1965年最高法院裁定这个法案违背了宪法第五修正案)。1950年2月，约瑟夫·麦卡锡 (Joseph McCarthy) 议员宣称，国务院里已经共产分子成灾。不过，鉴于当时的大气候，出现这样的危言耸听是不足为奇的。尽管到1954年，麦卡锡议员还一直坚持这样认为，但是他从未真正找到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间谍。1953年4月，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 总统颁发了10450号行政令，联邦雇员必须通过“安全风险”审查。这种审查有可能使联邦雇员因为与某些可疑的人或事有关系或者有某种可疑的个人习惯而被解雇。同年12月，原子能委员会吊销了原子弹之父 J. 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的安全许可证，原因是他曾与共产主义分子有瓜葛，并在40年代晚期对是否应该研究开发氢弹表示过怀疑。这些发生在世界大战后的“红色恐慌”每次都为时不短：在1917年至1954年之间，这种恐慌症一直持续存在着。1938年，众议院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专门来骚扰迫害共产党人。1940年颁发的史密斯法案目的也是如此。

虽然“红色恐慌”逐渐削弱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广泛支持，并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使共产党失去了战斗力，但是，对左翼政治带来最严重打击的还是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之间的互不侵犯协定。法西斯分子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利益瓜分交易给人们心头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损害了左翼党派和他们的政策原本享有的广泛支持和声誉。1936年至1938年间，臭名昭著的斯大林式的叛国罪审判也大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希望和可能。简言之，跨越两代人并在30年代达到顶峰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和组织，在后战时期实际上销声匿迹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对这段美国历史却并不关心，有时反而转向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家，寻求启迪与方向。^[4]如果说美国有过什么迷失的一代的话，他们也许就是曾经活跃于大萧条时期并继续生活在越南战争时期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文学知识分子。

[4] Ellen Schrecker, "The Missing Generation: Academic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from the Depression to the Cold War," *Humanities in Society*, 6 (Spring & Summer 1983), pp. 139–159.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

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是坚定不移地建立在下列原理之上的：(1) 物质先于精神（唯物主义）；(2) 社会活动和社会机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决定论）；(3) 社会群体之间的不断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学说）；(4) 劳动产生社会价值（劳动价值学说）；(5) 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化”引起异化（物化说）；(6) 劳动阶级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7) 无阶级的社会必定会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人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样重要的是，生产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或者基础结构）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文化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表明在某一个经济 / 物质发展阶段意识所设定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和美学的形式。最后，连续替进的“历史生产方式”（亚细亚、古代、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种模式是很公式化的。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美学的专门论述不多，而且零碎散乱，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要（重新）建构。^[5]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不到统一的美学理论，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方向和一致性的某些传统思路。在他们偶尔论及文学艺术的论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三个相去甚远的视角：(1) 艺术依赖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成；(2) 艺术是（而且应该是）政治活动的工具；(3) 艺术是相对独立的。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是第一种视角的第一位主要理论家，他系统地提出了艺术反映生活的观点。列宁是第二种视角早期有力的倡导者，后来查丹诺夫（Zhadanov）把它进一步体系化了。这种视角提倡：艺术必须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政治教育电影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现象。早年的托洛茨基（Trotsky）是第三种视角的拥立者。虽然他在《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1924）一书中对文学的独立自主圈定出种种限制，但是，他还是允许创作型艺术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有四种分析模式：第一种模式从历史和理论角度来探索文学和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总体地位。这一点与传统的美学相似。第二

[5] For an attempt at a systematiza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and for a useful bibliography, see Lee Baxandall and Stefan Morawski, eds., *Marx & Engels on Literature and Art*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3). 这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系统化的尝试，书后附有一份有用的参考书目。